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

泰戈尔传

漓江出版社

中國文學研究叢書

泰戈尔传

· 1 ·

泰戈'尔 传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

〔印度〕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

倪培耕 译



漓江出版社

511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

泰戈尔传

(印度) 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

倪培耕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16.5印张 插页4 381千字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49300册

书号: 10256·101 定价: 2.00元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

编辑说明

本丛刊为大型丛书。主要编译有关世界各国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的重要文学资料，以供外国文学、文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等工作作参考用。选材以有代表性、有重大影响或有较高学术价值者为主，兼收正面和反面教材，分册出版。每册有一个或几个中心。一般为资料汇编，个别则为专著。

丛刊的内容包括以下各个方面：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研究资料，2.文艺理论问题研究资料，3.文学史上重要时期、重要流派或思潮研究资料，4.现代、当代各国文学流派研究资料，5.重要作家和批评家、重要作品研究资料，6.其他。

译者前言

国内外持“欧洲文化中心论”的人往往漠视东方文学，西方种类繁多的印度文学史，写的也只是印度古典梵语文学。如果说一种文学或一个作家的影响与其祖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有关，那末使人类“完成自己使命”的“亚洲新纪元曙光”，“标志着二十世纪初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的“亚洲觉醒”，难道不能为现代亚洲文学显示世界影响提供必要的前提？难道不能哺育出具有国际影响的大作家？马克思说的“曙光”，列宁讲的“觉醒”，当时主要指的是印度和中国。几十年后，中国革命的成功，印度民族的独立，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不言而喻，它们的文学也应在世界文苑里占有席位。

事实也正如此。印度的泰戈尔从一九一三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欢迎，出现了波及世界文坛的“泰戈尔热”。当时，有的国家给他以国宾的礼遇，有的提灯游行，向他致敬，有的隆重集会，聆听他的演说。他的作品正如德国著名学者温德尼兹所说，“由东西方的译文传播到整个文明世界”，“为老年与青年所同样诵读欣赏”；苏联、中国、日本等国相继出版了多卷本的泰戈尔作品集，这种翻译热情至今仍不衰减。瑞典著名作家海登斯泰姆在为泰戈尔争取诺

贝尔文学奖时，在瑞典皇家学院的会上说：“我不记得，过去二十余年里我曾读过如此优美的抒情诗歌，从中我真不知道得到多少隽永的享受……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具有真正伟大水平的一个理想诗人。”爱尔兰著名诗人叶芝也说：“在这些诗里显示我毕生梦寐以求的世界，这些诗歌是高度文明的产物。”美国诗人庞德说：“我们发现了自己的新希腊”，在泰戈尔面前“我好像是个手持石棒，身披兽皮的野人”。中国文坛也有强烈反应，郭沫若回忆自己读了泰戈尔诗作时的情景说：“我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那清新和平易径直使我吃惊，使我一跃便年青了二十年！”冰心于一九一九年读了泰戈尔的“传略和诗文——心中不作别想，只深深的觉得澄澈——凄美”。不仅如此，他的影响不是昙花一现，也不是停留在作家的片刻的激动上，而且在不同国度的一些作家的创作思想及其风格的形成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迹。冰岛作家、一九五五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拉克斯奈斯说：“象其他西方读者一样，在我们国家里《吉檀迦利》的形象和芬香产生了我们闻所未闻的优美花朵般的影响。由于它的巨大影响，不少诗人进行了许多散文诗创作的新实验……我自己青年时期也努力用这种体裁进行创作。”我国的郑振铎在《飞鸟集》初版里说，当时一些小诗或新诗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间接受泰戈尔此集的影响”。郭老就声称他文学生涯的开始阶段为“第一阶段泰戈尔式”，二三十年代风靡一时的“冰心体”小说、诗歌、散文无不烙上泰戈尔的深刻影响。

当然，这种影响不限于艺术创作，也涉及思想意识方面。泰戈尔本人就是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他曾经在日本作了一个谴责帝国主义穷兵黩武的侵略政策的题为《民族主义》的报

告，罗曼·罗兰称誉这篇报告为“人类历史的转折点”的标志，还说他本人是“泰戈尔的唯一精神侣伴”。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泰戈尔“在自己漫长而富有成果的为人类服务里”，以他的“人民预言家（也可称为理想家）方式，到处宣传着一种美好和自由的思想”。法国女诗人戴·莫埃勒斯说，她曾同法国总理克雷孟梭，为了获得安慰和力量，一起读着安德烈·纪德译的《吉檀迦利》。可见，泰戈尔的抒情诗不仅是人们在沙龙里品味的艺术品，也可成为鼓舞人们热爱生活、追求理想的力量。

一个作家在国际上的影响，还取决于接受国的条件，因为接受国的取舍爱恶显然是不一样的。西方资产阶级接受的主要是泰戈尔的泛爱主义、和平主义甚至宗教神秘主义，他们从中寻求逃避现实的精神支柱或摆脱社会政治危机的灵丹妙药。而东方被压迫民族接受的主要是泰戈尔的反殖民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思想倾向，正如茅盾指出：“我们敬重他是一个怜悯弱者，同情被压迫人们的诗人；我们更敬重他是一个实行帮助农民的诗人；我们尤其敬重他是一个鼓励爱国精神，激起印度青年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诗人。”一九五六年，周恩来总理曾对泰戈尔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我们不厌其烦地援引了那么多材料，是为了说明“泰戈尔的诗名远远超越了他的国界”（冰心语）。泰戈尔震动二十世纪初的世界文坛，犹同印度五世纪迦梨陀婆的《沙恭达罗》震动十八世纪的欧洲文坛。“在古代希腊，竟没有一部书能够在

美妙的女性温柔方面，或者在美妙的爱情方面与《沙恭达罗》相比万一。”席勒这一番话与上引庞德的从泰戈尔诗作中“发现了自己的新希腊”的感慨，是颇为类似的。这说明，东方文明过去和现在，都在对世界文学作出自己的贡献，都在为世界文坛提供第一流的大作家。

广泛的国际影响引起了全球性的研究者的兴趣。全世界关于泰戈尔的论著，仅传记就达二百多种，其中较重要的有H·密耶尔·彭菲的《泰戈尔传》（1921），E·汤普逊的《诗人与剧作家泰戈尔》（1926），V·莱斯尼的《泰戈尔的人格与创作》（1939），普罗帕特库马尔·慕克吉的《泰戈尔传》（1956），以及我们这里译介的K·克里巴拉尼的《泰戈尔传》（1962）。就前三部传记的作者来说，汤普逊是英国文艺评论家，莱斯尼是捷克文艺评论家，他俩都曾在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执教，对泰戈尔及其作品有较深切的了解，提供的材料和观点具有一定的价值，但他们毕竟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艺评论家，对某些印度民族性的东西难以完全理解。慕克吉和克里巴拉尼则是土生土长的印度著名文艺评论家。不过，克里巴拉尼还有更优越的条件，他是泰戈尔的孙女婿，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一年在桑地尼克坦与泰戈尔生活在一起；他担任过《国际大学季刊》的编辑，独立后还担任印度文学院的领导职务。这样，他有条件充分掌握泰戈尔及其创作背景的材料。因此，他所著的《泰戈尔传》为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和美国纽约格罗夫出版社竞相出版，一九八〇年又由印度国际大学出版社出了第二版。

本书之所以受到国际泰戈尔研究者的重视，是因为作者既熟悉作家个人的生活经历，又注重作家创作活动的史实，在翔实的材料基础上，不仅对作家的个性和思想，而且对作家各个

不同创作阶段与作品，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因而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并能提供较丰富的知识。大致说来，本书特点有四：

首先，传记重视社会环境对作家的影响。本书作者说：“任何人不能完全超脱自己所处的环境。”传记叙述了孟加拉乃至印度民族资本的发迹，民族觉醒，社会改良活动以及席卷全国的民族独立运动。泰戈尔家族是这些历史过程的目击者、参加者，这个社会历史背景对泰戈尔家族成员的爱国思想及其性格的形成起了重要影响。没有这个背景，泰戈尔本人也许成为吟风弄月的抒情诗人，而不会成为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传记作者还详尽地描述了泰戈尔先后十二次远渡重洋，访问五大洲，从事和平运动，反对法西斯，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传记作者说：“他已超越一个印度公民身份，成为一个世界公民，这不是因为他业已扬名天下，而因为他与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晚期的大量政治抒情诗正是泰戈尔这些实践活动的产物。总之，我们从泰戈尔一生丰富的经历中，仿佛看到了印度民族的近代史发展的缩影。这种深邃的历史感增添了传记的思想分量。

不少传记作者往往把兴趣放在作家的私生活上，以揭示“隐私”来吸引读者。本书作者却相当严肃，不是津津乐道泰戈尔的私生活，而是紧紧扣住作家的创作生涯，对作家各个创作阶段的特点、作品的思想艺术特色及其创作背景，作了详尽的介绍。这是本书的第二个特点。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偏重于研究泰戈尔扎根生活土壤里的文艺创作。他认为泰戈尔从本质上来说不是宗教神秘主义诗人，而是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也

称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诗人。他说:“幻想从未使泰戈尔闭眼不正视现实,理想主义者的泰戈尔双脚是坚定地站在崎岖的现实土地上的。”因此,作者认为,把生活在人民之中、反映真实生活感受作为“履行生活的最高职责”,是“泰戈尔的真正的基本形象”。这样,诗人多年来给一些西方评论家颠倒的形象被颠倒过来,泰戈尔的本来面目得以重新显现。正是偏重于以这个标准评介泰戈尔的创作,因而对于面向生活、面向现实的作品,传记作者格外器重,大力介绍,比如泰戈尔早期的《故事诗》和爱国诗篇,晚期的政治抒情诗,百余篇短篇小说以及以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为主题的一些长篇小说和戏剧的评述,都在传记中占有较大的篇幅。

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传记作者把泰戈尔的思想及其创作,与歌德、托尔斯泰、甘地等人加以比较,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上评介泰戈尔。本传记引人瞩目地记载了泰戈尔接触歌德作品的情况:年青时代的泰戈尔努力通过德语研读歌德的《浮士德》,撰写了一篇关于歌德的论文,企图深入大师的巍峨的艺术殿堂。泰戈尔还十分欣赏歌德在《浮士德》中所表达的“在外部行动”的人生哲理;并多次谈到“歌德临死时希望‘更多的光’,在这样的时刻,倘若我心里还存有什么希求的话,那就是希望有‘更多的空间’”。“希望‘更多的光’”是对歌德一生崇尚自然、追求人类未来光明的高度概括,泰戈尔无疑从这里获得了启迪。他不仅追求光明,抒写光明,而且希望自然或上帝赐予他“更多的空间”,让他接触广阔的外部世界,让他在其中自由翱翔,让他在有限中企及无限。不仅在宗教哲学观,而且在文艺思想上,泰戈尔与歌德也有好些地方是心心相印的。歌德等德国古典文学运动的代表作家追求完整而和谐的

人，恰恰是泰戈尔终身倾慕的人道主义理想；他们的“庄严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的文艺思想，也是泰戈尔孜孜以求的美学理想；歌德的“在特殊中显示一般”则构成泰戈尔的主要创作思想。固然，泰戈尔以上思想的总渊源应该是印度古代传统的美学思想，但不能排斥他受歌德等人的明显影响。他和歌德还有一个相通的地方：歌德著作范围广泛，涉及诗歌、戏剧、小说、音乐、绘画、哲学、宗教乃至自然科学；泰戈尔在长达六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也踵武歌德，创作了五十部以上诗集、二十余种戏剧、近百篇短篇小说、十二部中长篇小说、二千多首歌、二千五百帧画，还有大量有关文学、哲学、宗教、教育等著作，也写了一部自然科学的书。因此，他们俩都堪称文艺巨人，为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人物。他们的不同也如相同那么鲜明，泰戈尔不象歌德始终在精神王国里寻求自由，追求业绩，而往往诉诸于“外部行动”，参加国内外一些重大政治活动，唾弃英殖民当局授予的“爵位”，身居茅屋，从事教育和农村改造的实践，数十年如一日。因此，泰戈尔心中没有歌德心中“经常进行着的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而且越到晚年越是进步。他访问并著文赞颂社会主义苏联，还通过游行、集会、著文、书信，反对法西斯，声援和鼓舞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总之，他不象歌德晚年倦于斗争，而是老当益壮。当然，这里也要看到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同，而不能归之于天禀的差异。

传记作者援引一家法国报纸的话说：“泰戈尔是印度的托尔斯泰”，“两个杰出的文学天才之间的相通”是“令人惊叹的”。的确，象托尔斯泰一样，泰戈尔不仅是一个艺术家，也是一个思想家和说教者，在其大量著作中反映了近代印度革命的历史特点，它的力量和它的弱点。应当通过什么样的道路，依

靠什么样的阶级力量，扫除什么样的思想障碍，印度才能获得民族解放，获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呢？当时在印度，有些人主张全盘西化，走西方资产阶级道路；有些人主张复古倒退，维护印度固有的保守传统；有些人主张用暴力摧毁殖民统治，有些人主张用非暴力实现民族自治。泰戈尔既反对洋奴派、又力排国粹派的主张，但他象托尔斯泰一样妄图用爱的哲学、道德自我修养、非暴力思想，来调和阶级和民族矛盾。所有这些思想在他的作品和实践中都有深刻的反映，尤其反映在被称为印度的《战争与和平》的长篇小说《戈拉》中，这也正是一定条件下资产阶级革命性和软弱性的集中体现。不过，泰戈尔高于一般资产阶级，他最先看到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传记作者说，泰戈尔认识到“扎根在土壤中的农民是印度经济和印度社会的坚实核心”，因而“从一八九〇——一九四一年五十年间，泰戈尔主要关心的是印度农民问题”。他大声疾呼，要拯救“大地的大而孤弱的孩子”，愤慨地指出：“我不知道，以平等方式把大地的恩惠赐给大地的所有儿子的社会主义理想能否实现。但倘若这样一个理想完全不能实现，甚至不能部分实现，那么我必须说，支配人类命运的法则实在太残酷了。”所以，他象托尔斯泰一样，利用自己有限的资源，在自己能起作用的有限领域，先是在自己的庄园后来在什利尼克坦，建立集体农业实验中心；帮助农民建立学校、医院、合作企业、银行和自治村社制度等。尤其可贵的是，他没有把自己的儿子送往牛津大学深造成“绅士”，而是遣往美国上农业大学，让他成为“优秀农夫”；他一贯教导学生参加农业劳动，树立为农民服务的思想，他提醒他们说：“我们每天在这大地母亲的怀抱里汲取营养，而我们有教养的杰出人物却在思想高空里漫游……如果我们所有绝妙思想都飘浮在空幻之中，那么新时代的播种季节将会变得毫

无意义。”所有这些说明他是关心印度农民的愿望和利益的。尽管如此，在他丰硕的创作中，直接以农民形象为主角，以农民直接利益为主题的作品，为数不多；而且他虽然看到了农民力量，却认为领导农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仍是“人类较高尚的部分”即资产阶级分子。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他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而不能苛求他。晚年，他思想发生了变化，认识到推动历史前进的是劳动大众：

他们形形色色的劳动散布在四方，
是他们推动整个世界在前进。

他自责道：

如果一位诗人不走进他们的生活，
他诗歌的篮子里装的全是无用的假货。

他等待着来自劳动阶层的诗人：

在文学盛宴中
让他来供献我不能奉献的一切。

由此可见，泰戈尔与托尔斯泰一样，是随着时代前进的。

传记还随着印度第二次民族独立运动高潮的出现，大量叙述了泰戈尔与甘地之间的思想对立。传记作者说：“一个是圣贤，努力把政治变为神圣的东西；一个是诗人，把神圣变成美。甘地的实践永远走在他思想的前头；而泰戈尔则展开理想的翅膀，凭空翱翔，他的实践却用步履蹒跚而行。”这段话形

象地勾勒出两者不同的实践和思想方式，但没有正确指出他们的本质区别。实质上，甘地代表了宗法制的农民利益，泰戈尔代表的是农民资产阶级利益。前者重视实践效果，思想却颇有中世纪宗教信仰的味道；后者更多地追求精神理想，具有资产阶级的博爱、自由、平等的思想。但前者善于发动和组织群众，后者则相信较高尚分子的领导力量。这样，甘地尽管以落后生产力去抗衡先进生产力，却团结了亿万群众；而泰戈尔尽管反对手纺车替代蒸汽机的愚昧做法，却始终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本书第四个特点在于，不是着力描述作家的文学生涯，而是刻意勾画一个完美的人物形象，寻求人物思想发展的轨迹。正如传记作者所说：“本书无意对他的文学进行分析批评，无意评价他的生活哲学，也无意评价他作为一个教育家与社会改革家或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所做出的贡献……本书旨在探寻一个多方面的高度完美的人格发展过程。”传记作者通过少年的磨练、青春的欢乐、艺术的追求、现实的教育、个人的不幸、民族的斗争、改革的实践、内心的苦斗、世界的召唤等生动的生活情节，把泰戈尔描写成一个博学、睿智、满怀理想、富有人情味、不断进击的完美形象。但传记告诉我们，泰戈尔思想发展的轨迹不是笔直，而是曲折的。他年青时沉湎于幻想，走向生活之后，热忱爱国，干预现实；中年时受到内外夹击，堕入神秘主义的冥想之中，慕求抽象的人类完美理想；晚年，则因火热的外界斗争又面对现实，向前奋进。传记作者还侧重于揭示诗人内心的矛盾。泰戈尔在晚年曾说过：他最大的优缺点都是“自相矛盾”，他内心犹如一个战场，“两股敌对力量在那里不断活动着，一种力量想使我脱离一切斗争，转向和

平，另一种力量鼓励我战斗。两方活跃的精力和行动的意志，不断地冲击着我那座印度平静的堡垒。”正是对这种内心冲突的大量描写，使泰戈尔的形象跃然纸上。但按照传记作者的观点，泰戈尔的伟大不在于丰富的内心矛盾冲突，而在于他的特殊平衡感，于是本书把泰戈尔描绘成英勇而不野蛮、富有同情心而不伤感、坚持理性主义而不是实利主义、信仰宗教而不是冥顽不化的教派主义、热忱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完美形象。所有这些使本传记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令人难以忘怀。

当然，不能说本书是尽善尽美的。要知道，泰戈尔毕竟是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他的作品渗透了抽象的资产阶级人性论，他企图以“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调和社会矛盾，否定阶级斗争。因而，从本质上说，他是位历史唯心主义者。传记对此缺乏分析，相反，它也正是从抽象的“人的观点”来展示泰戈尔的一切，来描绘他的“完美人格”，来分析他的创作思想和社会活动的动机。所以，传记必然揭示不出泰戈尔那种不可避免的内心和行动矛盾的社会和阶级根源。指出这一点，只是请我国的读者注意，而不是对传记作者作过分的要求。

本书根据一九六二年印地文版和英文版，对照译出。译完后收到一九八〇年的修订本，又根据新版作了部分校订。译文承蒙刘国桢、陈宗荣、刘健等同志校阅，特此表示谢意。

倪培耕

1984年3月

于北京

目 录

译者前言.....倪培耕

导 言.....(1)

第一章 家族的背景.....(17)

第二章 诞生和抚育.....(38)

第三章 少年时期.....(62)

第四章 青年时期.....(91)

第五章 入 门.....(119)

第六章 成 熟.....(141)

第七章 人群中的人.....(169)

第八章 上帝的人.....(209)